

中国历代
文学大观

先秦



文学大观

熊依洪◎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国历代文学大观

熊依洪 著

先秦文学大观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代文学大观 / 熊依洪著.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5402-1930-7

I. 中… II. 熊… III. 文学史—中国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0763 号

书 名: 中国历代文学大观·先秦文学大观

责任编辑: 梁 歌 增 光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 100 号 邮编: 10000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文昌印刷装订厂

版式设计: 李虎生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11.25

字 数: 558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2-1930-7

定 价: 450.00 元(全 6 册)

本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绪 论

一、先秦文学的渊源

以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为摇篮的中华民族,在数千上万年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独特的历史文化。中华民族创造的古老而璀璨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睿智和审美实践的结晶,是对世界文化宝库的特殊奉献。

文学是历史文化中的重要部分。按照我国文学历史的发生发展过程,从上古到秦统一以前(即所谓“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它产生在我国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秦以前的封建社会早期,是我国古代文学的发轫期。同时在诗歌和散文等方面,还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为后世文学的发展莫下了基石。因此,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对于认识我国文学优良传统的形成,审美意识的历史起源,以及我国文学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发生和发展,都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我国是古人类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据近年考古成果揭示,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以前,就有原始人类活动在我国土地上,并已进入旧石器时代初期。早在六十九万年以前,北京猿人,已知用火。距今约一万八千年以前的山顶洞人,靠渔猎兼采集生存,已知人工取火,出土器物除石器、骨器外,还有石珠、穿孔砾石和兽牙等装饰品,表现了原始人类美学意识的萌生。约一万年以前,社会已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华夏祖先在仰韶彩陶文化、北方细石器文化、南方大溪新石器文化中充分显示了大步改进了的文明技巧,标志着划时代的突破。仰韶文化是母系氏族时期以“彩陶”为代表的文化,距今六七千年。彩陶上彩绘着各种图案和线条。属于仰韶文化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形成时间约在六千三百年至六千八百年前,出土的彩陶除有图案外,已有类似原始文字的符号。形成于四千三百年至六千五百年前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出土了灰陶、红陶、黑陶,陶器上也已有类似文字的符号。文字的发明创造,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证明早在六七千年以前,我国先民们已开始向文明社会演进。当时的原始人,用极其简陋的劳动工具顽强地改造着自然,争取生存,同时也开始创造着人类最初的远古文化。

大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传说夏禹创建了夏朝。在此之前,我国早已进入农业社会,从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浙江河姆渡文化层已发掘出大量人工栽培稻谷的遗迹。到夏朝建立,已经是比较完整的农业社会了。从地下发掘来看,河南二里头文化一二期,约即夏文化,出土收割用的石刀甚多,证明当时农业已较发达;在其晚期已进入青铜时代。夏代已有激烈的政治斗争,如与有扈氏的战争,太康失政和少康复国的斗争等。《史记·夏本纪》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在夏朝中后期,夏、商族首领已用日干为名号,并早已用于支记日。墨子曾读过《夏书》,并把《禹誓》引出来(见《墨子·明鬼下》)。可见在传说中夏朝是有典籍文明的。《尚书·汤誓》引有夏代歌谣:“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记录了夏朝人民对暴桀统治的不满和反抗。

约公元前十六世纪,成汤灭夏建立了商朝。商代已是成熟的农业社会,据卜辞看,其时已用粪肥田,卜辞中有置闰月的资料,可见已注重农耕的季节。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中酒器最多,证明粮食收成较高和酿酒业已发达。冶铜业、手工业已达到可观的水平,出土的青铜器浇铸和镂刻的图案已相当精致。

殷商的文化已相当可观。1899年,在殷墟发现了甲骨刻辞。从1928年以来,在殷墟多次发掘的结果,发现了大量甲骨、青铜器等,并有宫殿、作坊、陵墓遗址。甲骨文有刻划的,也有朱书、墨书的,证明已有书写工具毛笔。殷商的先王都“有册有典”,现存《尚书》中《盘庚》等五篇,是比较可信的商代史料。殷商时代,极其崇尚巫鬼,巫风盛炽,引发歌乐、舞蹈的繁荣。其时贵族、巫覡常舞于宫中,“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墨子·非乐上》引《尚书·官刑》)。遇事往往迷信鬼神,以卜筮决定吉凶。现存《周易》一书,据说遗存有商代谣谚。殷商时期的青铜器,有的有铭文,称为“铜器铭文”或“金文”,是与甲骨文字同时并行而字体有异的特有工艺文化现象。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姬发率领诸侯攻灭商纣,建立了西周。西周是一个政治强大、经济发达的农业社会。西周前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据说周公制定了周朝的典章制度,上层建筑已相当完善。

西周二百多年间,文化比殷商进一步发展。出土的甲骨文记事更长。出土青铜器的铭文也更完整,最长的已近五百字。王室设置专职的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把记下来的帝王之“言”编为《尚书》,“事”编

成《春秋》。《尚书·周书》原有近百篇,分别记载帝王和贵族的文告、谈话等。早在西周成立以前,周人就创作了许多歌颂祖先的诗章;西周时又有采诗的制度,在朝廷宗庙举行仪式时加以歌唱,这就大大刺激了诗歌、音乐和舞蹈的兴旺。《诗经》中某些民歌和史诗,就是西周或西周以前的作品;另外,乐有“房中”、“雅”、“颂”之分,舞则有“大武”、“勺”、“象”之别,其中“大武”一次演出就有六场之多,其规模可见一斑。另外,研讨卜筮变化的《周易》一书虽有殷商资料,其补充写定实在西周。可见早在殷商西周,人们已经有了某些对于抽象哲理的深刻探究。

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历史进入大动荡大分化的春秋战国时代,历史和文学都掀开了厚重辉煌的一页。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收获丰硕的时代。从春秋开始,“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史记·天官书》)。号称“天下共主”的周王室已失去对各国的控制和尊严,统治地位、力量、权威急速下降,以致实际上沦为附庸;诸侯、卿大夫的实力却不断膨胀。所谓“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事实上主宰着这个时代。各国的政治斗争和战争愈演愈烈,弑君亡国屡见不鲜;大国争霸,小国结盟,兼并不已,干戈不息,人民深受苦难。这种社会动乱,乃是中国农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生产力要求解放和寻找出路的必然结果。春秋后期,鲁国三分公室,郑人“铸刑书”,晋国“铸刑鼎”,就是政治体制变革的先兆。战国初年,田氏代齐,韩、魏、赵三家分晋,标志着依靠宗法制维系的旧有生产关系已走到它的终点,新的地主政权已经在我国大地上正式确立。

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剧变,要求人们从观念上适应这场深刻革命。政治、军事、外交上的复杂斗争,促使各国诸侯和卿大夫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断总结经验,分析当时的局势,交流思想观点,进行理论探讨,提出各种各样的政治主张。这时,出现了“士”的阶层。奴隶制的崩溃,使“世卿世禄”的宗法制度受到了冲击,各国贵族出现了分化,其中一部分人地位下降,沦为“士”。同时,由于人身依附关系松弛了,大量奴隶变成了自由的平民,他们中的杰出人才脱颖而出,表现了高度的聪明智慧,构成了“士”的主流。他们是地位不同的知识分子,往往具有某种专门的学识与特长,积极参与政治、外交活动,到处游说诸侯,出谋献策,有的还著书立说,宣扬自己的主张。他们朝为布衣,暮为卿相,在政治舞台上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

从思想阵地及学术氛围看,春秋战国是一个大解放、大宽松的时代。学术的桎梏被打破了,风气比较自由,思想理论探讨没有受到压制。人们的主观意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进步,逐渐采取了与殷商西周不同的价值取向。从春秋末年起,文化逐渐下移,教育慢慢向平民开放。孔子开创了私人办学的先例,有弟子三千;墨子继起,最先与儒家并称“显学”。“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吕氏春秋·有度》)战国中期以后,讲学从师和著述之风更盛,孟子、庄子、荀子、邹衍、慎到、公孙龙等都是既讲学,又著书。出现了九流十家,即儒、墨、道、法、名、阴阳、纵横、杂、农、小说家,另有兵家不在其内。每一家都有大批门人弟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家内部又不断分化融合成不同的派别和集团。如儒分为八,墨析为三,法家则融法、术、势三派为一。代表各派别的各种哲学、政治和学术思想极为活跃,蓬蓬勃勃,呈现出所谓“百家争鸣”的盛况。他们互相驳难,激烈辩论,唇枪舌剑,自由抒发己见,构成我国学术史上最令后人羡慕的黄金时代,也是我国哲学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各种学术派别把自己的思想主张记录发表出来,涌现了大批文章和著作,不同体裁风格的各种散文著作都在这块土壤上繁盛起来。

战国后期,统一的趋势已经出现,大国加紧了兼并和统一的战争。楚、秦、齐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秦国自战国中期以来,就一直贯彻商鞅开拓的改革路线;而楚国自吴起在战国初年试行改革被镇压下去以后,统治集团的腐朽生活一直陈陈相因,醉生梦死,每下愈况。代表楚国贵族中的革新势力的屈原首先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力图挽狂澜于既倒,革新政治,推行新政,反而遭到腐朽势力的不断迫害。屈原无力回天,怨愤与忿怒并作,他在学习中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楚地的巫文化,写出了许多大放异彩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此后,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相继有作,南方便成为“楚辞”这种新诗体的摇篮。

在遥远的先秦时代,特别是春秋战国五百年,社会政治生活的丰富多彩,为文学的全面繁盛提供了合宜的良机。

二、先秦文学发展过程

先秦文学从远古洪荒的时代走来,如同涓涓细流,及至战国而全面称盛,势同江海。从其发展看,大概

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西周以前和西周。这一时期是文学的萌芽和幼年期,时间相当久远。最先,是文学现象的出现:原始人在劳动和实际生活中,由于交流思想感情和主观认识的需要而产生了语言;有了语言就有可能产生文学。实际上,最早的文学作品是原始人类在劳动等活动中创作的口头歌谣,即节奏韵律都极简单的原始诗歌。先民们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又将主客观相结合而按主观幻想创造出最早的叙事作品——神话。这些最原始的文学作品都产生于文字产生以前,是靠口耳传播的,绝大部分都在漫漫岁月中淹没了,只有极小部分流传并被后世的典籍记录下来。诗歌对于语言的加工与类比,是通过音声的节律而表情的艺术。神话则是真与幻的结合,某些神话是对英雄业绩的歌颂,是对美好事物的憧憬,其中无疑蕴含了原始人的审美要求和审美意识。

数千年前出现了文字。文字产生以后,用以记事记言,就可产生散文。因此散文的出现也甚早。现在地下发掘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散文片断是殷商的甲骨文和金文(铜器铭文)。但是甲骨文和金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象形文字了。甲骨文原是商代帝王占卜时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简短记录,几字至百余字不等,内容多是预测祸福判断吉凶之属。殷周铜器铭文是殷商和西周帝王、贵族镂刻在青铜器皿上的文字。墨子说古代帝王将他们的意见“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墨子·明鬼下》),道出了铜器铭文产生的缘由。铜器铭文主要记载贵族的功绩、论断、赏赐等。无论甲骨文或铜器铭文,都过于简括,缺乏文学的形象性,只能看做散文稚嫩的胚芽。

《周易》中的《卦辞》、《爻辞》是商、周时代专为卜筮所用的文字。有些地方记载了殷周或更久远的时代所发生的战争、祭祀和风俗等,表达了某种有普遍意义的生活经验和哲理。记事虽然也很简短,但比起甲骨卜辞更趋完整,并有某些生动的描述和形象显现。

《尚书》中现存《尚书》五篇,是殷商史实的记录。其中有的篇章出现甚早,如《盘庚》上中下三篇,是殷王盘庚为迁都而作的三篇演说辞,时当商朝中期,与甲骨文、金文属同一时期。但《尚书》比起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篇制更完整,不是分散零碎的片段,而是初具规模的文章。其中有些语言已可看出一定的技巧,使人感受到当时的气氛和口气。《尚书》证明了除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之外,商代还有篇幅和技巧都可观的实用性文体存在。

《尚书》中的《周书》原有八九十篇。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尚书》有一百篇,其中大部分为《周书》。经历代散佚,《周书》仅存十九篇。大部分是西周的作品,少量是东周所补。《周书》比《尚书》篇制更为完整,记言记事更复杂,结构大都比较严谨,有些篇章手法娴熟,有条不紊,显示出散文的进步。无论《尚书》或《周书》,大都表现了上古文字的特点,屈佶聱牙、古奥难懂,与春秋以后的散文差别甚大。

《诗经》是成于周朝的最伟大文学作品。《诗经》中的《商颂》,现在一般认为是周朝时宋国的作品,但即便如此,它也是依照其祖先商人的传统写下来的,而不是宋人才发明的。殷商庙堂就经常举行祭祀和歌舞,有歌即有辞,其辞就是“颂”体诗。事实上,现存《诗经》中某些篇章,就产生于西周建立以前,如周之先人的“史诗”,时间也是商代。《诗经》的不少作品产生于西周,特别是《大雅》和《颂》诗;还有相当一部分写于春秋中前期,尤以《国风》、《小雅》为多。《诗经》是我国社会最早的百科全书,它包括了当时各个社会阶层以至不同性别和不同社会经历的作者的创作;人们从中可以窥见周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国风》和《小雅》大多为中下层群众所歌唱,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这些诗具有浓烈的生活气息,风格淳朴自然,语言生动、形象,韵律和谐优美,已具有很高的艺术表现力。《颂》和《大雅》诗则多为庙堂和宫廷之乐,其中有一部分史诗性的作品,比较完整地勾画了先民们的发祥、创业和建国的历史,是我们古老民族的历史画卷。总之,《诗经》是我国文学发达很早的标志,从诗歌体裁上说,它包括了抒情、叙事、讽喻、颂赞以至史诗等各种文学样式。《诗经》是我国后世诗歌文学发展的基石和光辉的起点。

先秦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为春秋末至战国初期。这一时期,以崭新面貌出现的散文开始崛起,产生了许多历史著作。现存的有《春秋》、《国语》、《左传》。

现存《春秋》是当时众多历史书中的一部,实为鲁史大事记,据说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历史资料编订而成的,是孔子教育学生的基本教材之一。系年纪事,寓有褒贬,简练精严。《国语》是一些国家记事的史书,记载史实起自西周穆王,迄于战国初年的鲁悼公,分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历史。内容以记言为

主,也有记事。最初的记录者可能是各国的史官,在春秋战国之际由晋国的史官编纂成书。所记史事比《春秋》详细生动得多,保存了许多宝贵的史料;不过,记事是片断性的,并不系统完备。《左传》与《国语》平行而稍后,是仿照《春秋》记事次序,博采当时官方史料和许多流传于民间的材料而写成的一部杰出的历史散文著作。全书规模宏大,近二十万言,内容比《国语》更为广阔丰富,比较系统周详地记录了春秋至战国初二百五十多年各国的政治、外交、军事及社会生活风情。叙事状物、镂刻人物、语言技巧和结构布局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标志着历史散文已臻于成熟。

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诸子散文”开始崭露头角,出现了《论语》、《老子》、《孙子兵法》等著作。《论语》是孔子的门徒追忆他们与孔子谈话的内容及场面的记录,侧重于社会、伦理及教育学。《老子》是一部哲学著作,论述“道”的属性及人们对“道”应采取的态度。《孙子兵法》则是春秋时代最杰出的军事著作,是探索战略战术原则的兵书。总之,这些著作都侧重于一定的专业,并非纯粹的文学。基本上以语录体、格言体为主要形式,文字简练质朴,篇章短小,长的几百字,短的才几个字。内容多具有哲理性、策略性、警策性,但是论述往往没能充分展开,还带有明显的片断性。说明这时的哲理散文还处于初创阶段。

先秦文学第三阶段为战国中后期。这一时期是先秦文学的大盛时期,著述迭出,名家涌现。在散文方面,哲理散文出现了《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著作;历史散文则有《国策》、《国事》、《事语》、《长书》、《修书》、《短长》,后来到西汉时被刘向合并成《战国策》,又有《逸周书》、《竹书纪年》等书籍。

《墨子》一书的内容比较庞杂,大部分是墨翟与弟子讲学或谈话的记录,有一些是战国初年的原始材料,但其书则是由其门徒或后学在战国中期才辑录而成。重在宣扬墨家的“兼爱”、“非攻”、“节用”等所谓“十大主张”,在一些观点上可以看出与儒家学说的明显对立。《孟子》一书的作者是孟轲及其门人,写于战国中期,主要以多譬善辩的特色表达了孟轲所主张的“仁政”等民本思想。《庄子》一书的出现与《孟子》同时或稍后,是庄周与其门人后学所写作品的合集。以汪洋恣肆、仪态万方的“无端崖之辞”,继承和发挥老子“德”与“道”的学说于极致,形成了诡谲怪异的文章风格,极富浪漫主义的色彩和浓郁的诗情。《荀子》是先秦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况的论文专集,成书于《孟子》、《庄子》之后。荀况以博大而严谨的文辞,阐明了唯物主义的天道观,推出了“礼诗合一”的政治思想体系,并写作了《成相》和《赋篇》等文艺作品。《韩非子》一书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子所著,写成于战国后期。以凌厉峭拔的语言,发挥了商鞅“明法”、申不害“任术”、慎到“乘势”的学说,融汇成一种新颖的具有变革意义的富国强兵理论,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专著。《吕氏春秋》是战国后期秦国国相吕不韦主编、由其门客集体撰写的一部杂家著作,兼收并蓄,杂取儒墨道法等各家思想的长处,试图为大一统的封建帝国提供理论依据。

战国中后期,说理散文逐渐成熟。《墨子》、《孟子》、《庄子》的说理散文以论辩体为主要形式,在体制上已具有一定规模,语言生动活泼,表达自由酣畅,虽然还有语录体、对话体的痕迹,但有的篇章已向论说文过渡。而《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已是成熟的专题论著了。作者都不再局限于对话体的辩说,而是围绕某一中心进行专门探讨。文章结构严密,讲究逻辑和修辞,反映了先秦说理文的高度成就。

先秦散文著作繁多,还有一些书籍成书经过比较复杂,也有一定的重要性。《管子》是管仲的追随者、崇拜者所辑定的一部著作,其中有春秋时的一些史料,成书也在战国。《晏子春秋》是晏婴的传记资料汇编,其中资料有的来自民间传说,有的则来自春秋和战国中期的史书或私人著作,成书当也在战国。《国策》等书记写并讴歌游说诸侯的纵横家的活动及业绩,当系战国中期以后,出于苏秦张仪的门人宾客及其追随者之手。《礼记》中的某些著名篇章,例如《檀弓》、《礼运》等篇,曾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原是先秦儒家的论文集,当也成于战国儒者之手。此外,各家著作如《商君书》、《公孙龙子》、《申子》、《慎子》、《周礼》、《逸周书》、《竹书纪年》等,都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和反映了那个伟大的时代。还有一批著作曾在近代疑古风气下被疑为伪作,如《六韬》、《文子》、《尉繚子》、《尹文子》等等,近期经考古和考辨证明或并非伪书。这些著作中的大多数,也出现于战国中期以后。近年的地下考古获得了丰硕成果,新发现了一批古铁书籍,例如《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十六经》、《相马经》以及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等,都已被确认为战国时期的著作,并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所有以上这些,反映了战国中后期的著作潮、文化潮,显示了先秦散文的空前繁盛。

战国后期,在南方广袤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以宋玉、唐勒、景差等为追随者,创造并兴起了一种与《诗经》不同的新诗体——“楚辞”。楚国的伟大诗人屈原,企图以“美政”改造国家社会而反遭贵族腐朽势力的迫害,以至他上下求索,悲愤填膺,遂以诗句作抗争,为歌哭,写出了瑰丽的文学奇葩《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一系列诗章,抒发自己的崇高理想,表示了对真理、对富国强兵的不渝追求和对楚国的忠贞与厚爱,唱出了一曲曲热爱祖国的悲壮长歌。屈原以强烈的抒情结合丰富的幻想、美妙的神话而创造出奇丽多姿的诗篇,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浪漫主义的艺术高峰。稍后,宋玉的《九辩》,刻意学习《离骚》,而又匠心独运,在艺术上有开拓和创新。《汉书·艺文志》著录宋玉的赋有十六篇,《文选》所载其《高唐赋》、《神女赋》、《风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是我国赋体文学的滥觞。

先秦时代的众多文学作品,如熠熠明珠般投射于文学史册,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它们不同的价值和审美力度,在思想的深邃和艺术的成功方面,成为我国文学的第一个丰收的黄金季节。

三、先秦文学的地位和影响

先秦文学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对后世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它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像巍巍山岳,令后世无数作家仰止。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源,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根”。

先秦文学产生于动荡变革的伟大时代,是时代精神的折射。众多作品所共同表现的社会价值观念、政治理想、伦理意识、人文精神,最终都沉淀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诗》、《书》的现实主义传统、政治经验,向来备受历代文学家、政治家珍视和称道。而众多的历史散文、诸子著作所表现的求实精神、民本思想、政治技巧、礼法主张、变革观念、哲理思辨,更为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所追慕、探讨和学习。伟大诗人屈原所表现的深挚的爱国主义、对真理坚贞不屈的追求精神,则从思想上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与文人。总之,先秦文史哲著作所反映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一直滋润着中国社会的各层次的人群,在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教育、伦理、文学艺术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在文学流变史上,先秦文学的体裁风格和各种表现手段,一直被视为后世各类文体写作的楷模。北齐颜之推说:“夫文章者,原出五经。”(《颜氏家训·文章篇》)虽然并非一切文章体裁皆出于“五经”,但他认为文章的根源深远,远在先秦,却是事实。清人章学诚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文史通义·诗教上》)就文章的体制和写法而言,先秦时代确实在大部分领域已开后世先河,许多文体、手法都可以从先秦找到源头。后世许多新兴文体的产生和昌盛,往往受到先秦文学的启示。

就诗歌而言,从远古的原始诗歌而至《诗经》,达到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艺术高峰,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自然朴素的艺术风格,以及赋比兴的艺术手段,都为后世所珍视。发展而至“楚辞”,登上了浪漫主义的艺术高峰,其在南方楚文化的基础上,兼采幻想、神话、传说、历史、巫歌入诗,奇文郁起,大放异彩,把诗歌的表现手法和领域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从此,后世将“风”、“骚”并称,并视为我国文学优良传统的开端。

另外,先秦在上古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基础上,还出现了《山海经》、《穆天子传》这样宏大的地理神话故事集,实为后世志怪、传奇乃至古典小说的幼芽。而众多的寓言、史传性特写,有的已有“准小说”的特征。就散文而言,《左传》、《国语》、《战国策》无论体制或手法,都是后世文言散文的范本,并对后世小说、戏剧的创作启迪甚大。诸子散文表现的明显有异的风格个性,更是使后世学者、文章家获益匪浅。如《论语》雍容和顺、含蓄迂徐;《墨子》质朴平易、逻辑严密;《孟子》灵活善譬、多辞好辩;《庄子》想象丰富、诡异恣肆;《荀子》结构谨严、论断缜密;《韩非子》辞锋峻削、说理透辟等等,都足以供后代文学家学习借鉴。就辞赋和骈文而言,前者极盛于两汉,后者流行于六朝,并为后世的重要文体,而其源亦在先秦。

综上所述,先秦时代是我国古代文学产生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它以四五千年前远古文化为开端,而结束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以前。在这样一个离现在久远的年代,我国人民所创造的当时世界上所稀有的古代文明和灿烂文化,完全可以与古代欧洲的“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相映媲美。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瑰宝。

目 录

绪 论	1
-----------	---

第一编 上古文学

第一章 上古歌谣	3
第一节 文学艺术的起源	3
第二节 上古歌谣的产生	5
第三节 上古歌谣赏析	6
第二章 上古神话	18
第一节 神话的产生和记录	18
第二节 上古主要神话	19
第三节 上古神话的特征	22
第四节 上古神话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23
第三章 殷商和西周礼乐文化	26
第一节 甲骨卜辞与铜器铭文	26
第二节 西周礼乐文化的起源发展与繁荣	27
第三节 周公制礼作乐与礼乐文化	31
第四节 西周礼乐文化对先秦儒家文学的影响	36
第四章 《山海经》和《穆天子传》	40
第一节 《山海经》的成书时代	40
第二节 《山海经》的价值	40
第三节 《山海经》神话类别	42
第四节 《山海经》对以后文学的影响	43
第五节 《穆天子传》及文学成就	44
第五章 《周易》	46
第一节 《周易》概述	46
第二节 《易经》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47
第三节 《易传》是一部散文体著作	48
第四节 《周易》提出文学审美、批评的基本理论	50
第五节 名篇赏析	53

第二编 先秦诸子散文

第一章 孔孟与儒家散文	67
第一节 儒家文学思想的理论流变	67
第二节 孔子的思想	76
第三节 《论语》的文学价值	78
第四节 孟子的思想	80
第五节 《孟子》的论辩艺术	81
第六节 《孟子》的比喻和寓言	85

第七节 《孟子》散文的艺术特色	86
第八节 《孟子》散文的贡献及其影响	87
第九节 荀子的哲学观和文学艺术思想	88
第十节 《荀子》中的政治思想	91
第十一节 《荀子》的文学价值	96
第十二节 《曾子》	99
第十三节 《子思》	100
第十四节 《礼记》	102
第十五节 《孝经》	104
第十六节 名篇赏析	105
第二章 老庄与道家散文	153
第一节 老子及《道德经》	153
第二节 《道德经》的基本内容	154
第三节 《道德经》的思想	158
第四节 《庄子》的哲学观、政治观和美学观	162
第五节 庄子对儒家的批判与理想中的“至德之世”	164
第六节 《庄子》寓言及其成就	169
第七节 《庄子》散文的风格特征	172
第八节 《庄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174
第九节 《列子》、《鹖冠子》、《文子》、《黄老帛书》	175
第十节 名篇赏析	181
第三章 韩非与法家散文	203
第一节 韩非思想	203
第二节 《韩非子》的政论散文	204
第三节 《韩非子》的寓言故事	205
第四节 《商君书》、《慎子》、《列子》、《申子》	206
第五节 名篇赏析	209
第四章 墨子与墨家散文	235
第一节 墨子的兼爱思想	235
第二节 《墨子》内容	237
第三节 《墨子》的教育思想	239
第四节 名篇赏析	243
第五章 吕不韦与杂家散文	252
第一节 《吕氏春秋》思想	252
第二节 《吕氏春秋》的故事和寓言	253
第三节 《管子》	255
第四节 《尸子》	257
第五节 名篇赏析	259
第六章 孙子与兵家散文	275
第一节 《孙子兵法》、《孙臆兵法》	275
第二节 《吴子》、《尉繚子》、《六韬》	277
第三节 名篇赏析	279
第七章 纵横家与名家散文	295
第一节 纵横家及作品	295

第二节 公孙龙与《公孙龙子》	295
第三节 《尹文子》	297
第四节 名篇赏析	299
第八章 晏子	302
第一节 晏子及《晏子春秋》	302
第二节 《晏子春秋》的文学特色	306
第三节 名篇赏析	308
第九章 李斯与其他秦国散文	310
第一节 李斯及散文成就	310
第二节 石鼓文、诅楚文、新发现的秦国文书	312
第三节 名篇赏析	314

第三编 史家典籍

第一章 《尚书》	319
第一节 《尚书》概述	319
第二节 《尚书》的思想特点	320
第三节 《尚书》的文学价值	321
第四节 关于《逸周书》	322
第五节 名篇赏析	324
第二章 《春秋》	335
第一节 《春秋》概述	335
第二节 《春秋》的文学价值	336
第三章 《左传》	338
第一节 《左传》的作者与成书年代	338
第二节 《左传》的思想体系	339
第三节 《左传》的文学成就	343
第四节 《左传》的史学价值	348
第五节 《左传》的流传与研究	352
第六节 名篇赏析	358
第四章 《国语》	368
第一节 《国语》概述	368
第二节 《国语》的文学价值	369
第三节 名篇赏析	371
第五章 《战国策》	379
第一节 《战国策》概述	379
第二节 《战国策》的寓言故事	381
第三节 《战国策》的散文艺术	382
第四节 名篇赏析	385
第六章 其他历史著作	400
第一节 《公羊传》、《穀梁传》	400
第二节 《汲冢琐语》、《竹书纪年》	403
第三节 《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	404

第四编 诗 歌

第一章 《诗经》	409
第一节 《诗经》概述	409
第二节 《诗经》的艺术成就	416
第三节 《诗经》的文学思想	421
第四节 《诗经》的地位和影响	425
第五节 名篇赏析	427
第二章 楚辞	482
第一节 楚辞名称溯源	482
第二节 楚辞与楚国社会文化	487
第三节 屈原	495
第四节 宋玉及其它楚辞家	498
第五节 名篇赏析	500

第一編 上古文學

上古文学主要包括上古歌谣和神话以及殷商文化。上古文学发生的最终原因,只能从原始人类生存斗争的实际需要中去寻找。处在人类最初阶段的原始人,不可能离开求食和保存种族等的基本需要,而产生什么审美活动,而去从事什么艺术的创作。普列汉诺夫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研究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后指出:“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观点来看待他们。”他说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将一点也不懂得原始艺术的历史”(《论艺术》),因而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认为最早的文艺作品产生于人类的劳动过程之中,它是根据劳动的实际需要而出现的。这一考察及其所取得的认识,才把艺术的起源问题从各种现象的、唯心论的认识移到了唯物史观的科学的基础之上。

根据历史的考察,在文学中,最初产生的文学样式——诗歌,就是人类在从事集体劳动中,依照着劳动时的节奏,因袭着劳动呼声的样式而产生的。原始人的劳动多是笨重的体力劳动,所谓劳动的呼声,就是当人们从事一项吃力的体力劳动的时候,为了减轻一些疲劳,或为了在集体劳动中,协调一下彼此的动作,自然而然地依照着劳动动作而发出的一种呼声。这种呼声具有一定的高低和间歇,因而形成一定的节奏,这种简单的节奏,正是诗歌韵律的起源。关于这一情况,我国古人也做过一定的观察,例如《淮南子·道应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邪许”,就是指人们集体劳动时,一倡一和,借以调整动作、减轻疲劳、加强工作效率的呼声。举重时是这样,从事其他劳动时,也会是这样。可以设想,最早的有节律的诗歌也正是伴随着劳动、因袭着这种劳动呼声的样式而产生出来的。

而上古歌谣比神话产生更早,它是我国后世古典诗歌的摇篮。上古神话比歌谣更富于文学性和浪漫主义色彩,对我国后世文学的影响更为广泛深刻,是我国文学的重要武库和土壤。

第一章 上古歌谣

上古歌谣是在生产力极为低下、没有文字记录的原始时代产生的,是出现最早的文学样式,是上古先民集体的口头创作。上古歌谣最初起源于劳动,是先民在劳动过程中,为协调劳动节奏、减轻疲劳、激发劳动热情,而喊出的“杭育杭育”之类的劳动号子。后来随着劳动对先民思维能力、发音器官和语言能力的锻炼发展,有节奏的呼喊逐渐为有意义的语言所代替。这样,一种富于韵调和节奏感的真正诗歌便产生了。再后来作为一种有节奏的语言形式逐渐固定下来,成为先民反映生活、抒发情感的一种特有形式。于是,即便不在劳动场合,它也同样使用,从而显示出上古歌谣的丰富多样性。

第一节 文学艺术的起源

根据历史的考察,文学艺术的产生早于文字,它们在人类社会活动的最初阶段,即原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历史资料表明,原始诗歌和原始神话,是最早出现的两种文学类型,它们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行的,从产生的先后说,诗歌应更早于神话。

文学艺术是怎样产生的,是什么样的原因推动了文学艺术的出现,这是世界各民族文学共同存在的一个需要探讨的科学问题。

关于文学艺术的起源,历史上曾经有过种种不同的解释,可以说自从文学艺术产生以来,人们就开始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世界各国就都出现过一些关于文艺来源的神话。例如,在我国古代《山海经》一书里,就有这样的记载:夏朝的开国君主夏禹的儿子夏后启,是一个神通广大的英雄。他曾三次乘飞龙上天,偷偷地把天乐《九辩》和《九歌》记录下来,带回到人间改编作《九招》,在“大穆之野”演奏。据说从这以后,人间才开始有了文艺作品,有了美妙动人的歌曲。在古希腊,也有关于文艺女神缪斯的传说:宇宙之王宙斯和“记忆”女神曼摩辛结婚,生了九个神女,这九个神女分别掌管着诗歌、音乐、戏剧、舞蹈等等,人间的诗人、艺术家们就是得到她们的启示和教导,才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来。把文学艺术的产生归之于上天神灵的创造和赐予,反映了原始人极为幼稚的观念。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各个时代的思想家、历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不断地就文学艺术的起源问题进行探讨,提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在众多解释中,影响较大的说法主要有游戏说、心灵表现说、巫术说和模仿说等等。主张游戏说者认为,人类有一种发泄剩余精力的本能,游戏和文艺就都是由于这种本能的冲动而引起的。这是十八世纪欧洲席勒和斯宾塞首先提出的理论。实际上,作为单纯消遣性的游戏,只是后来才可能有的,在原始人那里,游戏并非没有功利性质,这从原始人游戏的内容就可以看出。普列汉诺夫曾举例说:“澳洲土人的儿童常常玩战争的游戏,而且这种游戏极受成年人的鼓励,因为它锻炼未来的战士的机警和敏捷。”(《论艺术》)原始人游戏的内容,或为战争,或为狩猎、采集,总是与他们的社会生活需要相联系的,实际上是对劳动过程的一种再体验和训练。如果说原始歌舞产生于游戏,是从游戏脱胎出来的,那么“游戏是劳动的产儿”,也是无疑义的。主张心灵表现说(亦称感情说)者认为,人生来就有一种表现自己感情的要求,高兴了就要笑,痛苦了就要哭。这种要求进而从音乐、语言、形体上表现出来,就产生了音乐、诗歌、舞蹈等等。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说:“艺术起源于一个人为了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他给艺术的定义就是:“作者所体验过的感情感染了观众或听众,这就是艺术。”(《艺术论》)实际上这种理论在我国产生得更早,汉代《诗大序》上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淮南子·本经训》云:“心和欲则乐,乐斯动,动斯蹈,蹈斯荡,荡斯歌,歌斯舞。”这实际是后世对诗歌创作心理和经验的说明和总结,并不足以说明原始诗歌最初产生的具体动因。原始诗歌有它的特定的社会内容和形态,它的发生是不能单纯用表情这一动机来解释的。主张艺术起源于巫术者认为,诗歌渊源于原始巫术的咒语。原始时代生产力低下,生存困难,从而产生了企图用语言控制自然、支配自然的巫术,在巫术活动中产生了最早的诗歌、音乐和舞蹈等。原始人的某些艺术确实曾附丽于巫术的活动,但当时的

原始信仰本身,却是出于人类物质生产需要,因此巫术本身并非文艺所由产生的最后根源。主张模仿说者认为,艺术起源于对自然和人生的模仿,这一说法始于古希腊的哲学家。如德谟克利特说:“在许多重要事情上,我们是模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那里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著作残编》)亚里士多德说:“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模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模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模仿得来的),人对于模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诗学》)类似的理论在中国古代也曾有过,如《吕氏春秋·古乐》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这也是一种模仿论。这种说法与前面一些说法不同,它肯定了文学艺术来源于人对客观世界的模仿,成为后世“反映论”的基础。但事实上,即使是从原始的艺术活动(包括歌舞、绘画)看,模仿也只构成艺术的外观,是手段,并不就是艺术的创作动机或目的。总之,上述关于艺术起源的解释虽各有不同,但他们总企图从人类的所谓先天本能出发,或者根据后世文艺创作现象加以推测,结果并没有真正科学地回答出这个问题。因为很显然,上面提出的一些解释,它们都不能说明文学艺术为什么只是人类发展到某一历史时期的产物,而不是更早——从中国历史资料看,大约到了传说中的神农、黄帝、尧、舜等时代,可能已进入氏族社会后期,正是相当于传说中的这个时期,我国产生了以绘有各种精美图案花纹的彩色陶器为标志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有了相应的某些文学艺术萌芽。它们也不能说明原始的文学艺术为什么有它的特定的思想内容和形式,而不是其他。总之,以上种种说法,虽然都接触到文学艺术产生过程中的某些现象,但都是脱离了人们的社会实践,单纯从生物学角度的人和人的先天禀赋来回答这个问题,从而都没有能对文学艺术的起源做出科学的解释。

文学艺术发生的最终原因,只能从原始人类生存斗争的实际需要中去寻找。处在人类最初阶段的原始人,不可能离开求食和保存种族等的基本需要,而产生什么审美活动,而去从事什么艺术的创作。普列汉诺夫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研究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后指出:“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观点来看待他们。”他说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将一点也不懂得原始艺术的历史”(《论艺术》),因而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认为最早的文艺作品产生于人类的劳动过程之中,它是根据劳动的实际需要而出现的。这一考察及其所取得的认识,才把艺术的起源问题从各种现象的、唯心论的认识移到了唯物史观的科学的基础之上。

根据历史的考察,在文学部门里,最初产生的文学样式——诗歌,就是人类在从事集体劳动中,依照着劳动时的节奏,因袭着劳动呼声的样式而产生的。原始人的劳动多是笨重的体力劳动,所谓劳动的呼声,就是当人们从事一项吃力的体力劳动的时候,为了减轻一些疲劳,或为了在集体劳动中,协调一下彼此的动作,自然而然地依照着劳动动作而发出的一种呼声。这种呼声具有一定的高低和间歇,因而形成一定的节奏,这种简单的节奏,正是诗歌韵律的起源。关于这一情况,我国古人也做过一定的观察,例如《淮南子·道应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邪许”,就是指人们集体劳动时,一倡一和,借以调整动作、减轻疲劳、加强工作效率的呼声。举重时是这样,从事其他劳动时,也会是这样。可以设想,最早的有节律的诗歌也正是伴随着劳动、因袭着这种劳动呼声的样式而产生出来的。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论到文学的起源时曾经有这样一段话:

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这说明最早的文学创作,正是在集体劳动中根据劳动的需要产生的。当然,仅只是简单的“杭育杭育”的劳动呼声,也许还谈不上就是什么真正的诗歌作品,但它是原始人最初的歌唱,是后来有韵律、有节奏的诗歌赖以产生的基础。也就是说,当这种劳动中的呼声一旦被语言所代替或与一定的语词、语音相结合时,语言便有了它的歌唱形式,呼声也有了更丰富、确切的含意,于是一种具有节奏性、音乐性的语言艺术——诗歌,也就正式产生了。

诗歌的产生是这样,其实与原始诗歌产生于同一时代,并经常与原始诗歌结合在一起的原始乐舞,也无不是这样。原始的音乐,就是劳动音响的再现,最初的乐器几乎无不是从原始的劳动工具转化来的。例如

我国古代的敲击乐器石磬和其他一些弦乐器,就都是由原始的劳动工具石刀、石斧和弓箭的弦索改装变化的。原始舞蹈的内容和舞姿,则更明显地表现出是某种生产动作的模仿或某一劳动过程的重演。由于劳动是有节奏的,因而再现劳动音响和动作的乐舞也是依从一定节奏的,而古时(中国的或外国的)舞蹈、音乐、诗歌之所以经常是三位一体的,也正是由劳动节奏的一致性所决定的。

上面说到,诗歌的产生是由于劳动的需要,是原始人组织劳动、鼓舞劳动的一种手段,而乐舞的产生,在原始时代也同样出于劳动的实际需要,有着明显的功利目的。原始人的乐舞,模仿劳动的音响、劳动的动作、重演劳动的过程,这或者是出于训练劳动技巧、总结劳动经验的需要,或者是为了教育本部落的成员,激发他们的劳动热情,以便更积极无畏地参加生产劳动。也就是说,它们也无不同劳动生活的实际需要有密切关系。需要附带说明一下的是,所谓劳动或劳动生活的需要,在原始人那里也包括他们在原始宗教幼稚的观念支配下产生出来的某种幻想中的需要。原始人不认识自然的客观规律,往往以为周围的世界是可以用自己的意志随便改变的。因此,他们相信自己语言的力量,相信他们歌舞活动的作用,认为用它们可以影响自然界,可以影响神(自然力的化身),于是常常把诗歌当做“咒语”来使用,也把歌舞作为娱神的工具。但目的还是为了满足对现实的要求,即企图用它们来控制自然灾害,或在生产中获得丰收。

总之,如上所述,最初的一切文学艺术,都是来源于原始人的劳动实践和劳动实践中的需要。它们或者是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直接产生出来的,成为组织劳动、激发劳动热情(所谓“动力”)的一种手段;或者是模仿和再现劳动生活情景,以巩固劳动经验,熟悉劳动技巧;或者是出于某种幻想,企图用它来战胜自然,争取丰收。因此,文学艺术的起源,决不是由什么人类的生物本能冲动所引起的,最初的文学艺术创作,也决不是什么超功利的、不抱任何社会目的的活动。离开人类的社会性,离开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他们最基本的社会实践——生产劳动,去探寻和解答文学艺术的起源问题,都只能是唯心主义的、错误的。

第二节 上古歌谣的产生

原始时代的文学作品,由于年代久远,当时又没有文字可以记录,因此大都淹没不存,很少被保存下来,所谓“虞夏之前,遗文未睹”(《宋书·谢灵运传》),造成了后世研究的困难。我国古书中虽然记载了一些所谓尧、舜传说时代的歌谣,如《击壤歌》、《卿云歌》、《南风歌》等,但都是出于后人的伪托,不可信。只是在某些古籍中偶尔保存下来一些质朴的歌谣,从它们的思想和形式上看,比较接近原始形态。

诗歌起源于劳动,最初是与劳动动作相联系的,因而人们在劳动动作中产生的呼声,就自然而然地决定了诗歌的节奏。但这种有节奏性的语言形式一旦形成,就逐渐固定下来,成为反映生活、抒发情感的一种特有形式。因此,即使不在劳动场合,不作为劳动伴唱的时候,它也同样作为一种诗歌的形式(即诗体)而使用着。

我国原始型的诗歌大都是二言形式,这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是在原始社会,生产技术底下,从而劳动动作也很简单,而歌的拍子总是十分精确地适应于这种劳动所特有的生产动作的节奏。这时劳动的节奏是短促的、鲜明的、整齐的,因而伴随劳动动作产生出来的诗歌,它的句式也必然是极简短的。第二,诗歌是与本民族的语言特点紧密相联的。在远古时期,人们的思维和语言还都十分简单,在当时的汉语中,单音词比较多,即一个词是由一个音节所构成;但一个单词并不能构成句式,也就是说,至少要两个词才能表达出比较明确的或相对完整的意思。这样,由两个词构成一个短促的句式,以与由劳动动作所派生出来的节奏相配合,就是原始型的最早的诗歌形式。当然,随着社会和语言的向前发展,诗歌的内容和形式都会多样化起来,同时,诗歌创作中的单纯的功利目的,也会逐渐渗透进更多的审美需要和审美趣味,这时诗歌也就成为独立的精神产品了。

原始氏族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年代,作为当时的口头创作诗歌作品来说,其数量一定会是不少的,只可惜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无闻。但从这仅存的少数子遗来看,它们却闪烁着人类童年时期所特有的生动、活泼、天真的光彩,表现出我国先民们可贵的艺术创造力。同时为我国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诗歌历史,奠定了基础。